

中國軍人偉大

楊昌溪著

1938

上海

金湯書店版

124756

自序

著者不是軍人，但常在軍中，一生同軍人接觸的機會很多，故敢冒昧來作這種他人未做過的嘗試。

我四年前在江西便有試作本書的企圖，但外力的刺激並不多，也只零星的寫了一點來發表。直到八一三淞滬抗戰發生，這一次嚴陣而英勇的應戰，把中國鑄成了一個碩大的巨人，昂然的直立起來。由於英勇戰士的犧牲和奮鬥精神的感召，我決心來完成本書。——尤其是我讀了俄國人郭泰納夫論中國軍人的書，使我堅定了迅速完成的決心；既然一個外國人能作他的觀察，身為中國智識份子的我，更應負擔起這個責任。

著者此書只是一種嘗試，本着「嘗試成功自古無」的話，本書也許是失敗了的。不過著者敢以虔誠的意思祈求各方直接惠函來指正。如果指示的是正確，無有不在再版時改正的。（惠示請暫由重慶商業場今日出版合作社轉）而且作者還想作繼續的研究，如果讀者願意作詳細的討論，或供給以實際材料及遺問軼事，一經錄用，著者願以本書為酬。

再本 來預備刊登一些此次抗戰實況的珍貴照片，可是因爲銅版紙缺乏，只得以後再添。同時選作附錄的各種改革軍隊文字，也因篇幅限制刪去。然而著者總願有一日能將上述的二項辦到，至少是抗戰發生後一種難得的文獻。

臨末，對本書出版，在精神助力上應予以感謝的是巨良先生和文煥兄。而行驤兄擬擇一部份譯成英文，由其美籍夫人交美國雜誌發表，如果使美國人能加增對中國抗戰的同情，而給世界文化的毀滅者以打擊，那應致感激之忱的不止著者一人了。

楊昌溪

二十七年二月五日，時
正敵機襲宜之次日。

中國軍人偉大目錄

自序

第一章 中國人戰爭思想之檢討

(一) 中國人戰爭思想之檢討

(二) 中國先賢的戰爭觀

(三) 中國軍事學家的戰爭觀

(三) 中國戰爭思想給與日本之影響

第二章 中國軍人的特質與精神

(一) 中國軍人的偉大

第三章 徵兵與兵的素質之改造

- (一) 中國軍人與孔子思想
- (二) 中國軍人與英雄崇拜

- (一) 中國歷代的兵役制

- (二) 軍訓與徵兵制的實施

- (三) 軍訓與兵役

第四章 抗戰與中國軍人素質之擅變

- (一) 過去中國兵的素質之腐敗

- (二) 太平軍與中國兵素質之改變

- (三) 國難與中國素質之擅變

第五章 中國軍人的戰鬥性

(一) 中國軍人的戰鬥性

(二) 軍人抗戰精神的偉大支持者

(三) 戰鬥性與地理環境的影響

(A) 北方的尙武與豪俠

(B) 南方軍人的戰鬥力

(C) 飲食給與南北軍人的影響

(D) 北方移民對於南方民族的影響

(四) 黃埔精神與廬山精神

(五) 中國軍人之進步

第六章 中國空軍的戰績

(一) 中國空軍的發展

(二) 飛將軍的戰鬥力與抗戰情緒

(三) 中國空軍的將來

(A) 技術的訓練問題

(B) 政治的訓練問題

第七章 中國軍人的改造及其將來

(一) 外患與軍備的改進

(二) 外人眼中的中國現代軍人

(三) 抗戰中的游擊戰術

(四) 全面抗戰中的兵士與統帶

(五) 全面抗戰與中國兵士之將來

- (A) 抗戰後的兵士與民衆
- (B) 外人論抗戰受挫的原因
- (C) 中國兵士之將來

第一章 中國人戰爭思想之檢討

(一) 中國先賢的戰爭觀

論到軍事，如果要在中國先賢的遺教中覓出一種確切的根據，一定是會使人失望的。因爲在先賢中，無疑的可作代表的，是儒家，而儒家的王道思想便是寄託遠肇于堯，舜，禹，湯，文，武，的所謂王道思想。由所謂王道思想的繼承，孔孟一生所做的都是「祖述堯舜，顯彰文武」的工作。

孔子喜言「仁」，孟子喜言「仁義」；因此，在政治上所表現的主張，便是「德治」與「體治」。孔子說：『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即是說：爲政者不在「武力」，有了「德」，人民擁護的情狀，正如衆星之拱北。繼承孔子思想的孟子，他更明白地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因此，孔子在答弟子詢問治國的主旨時，認定在「足食足兵」兩要素之下，不得已而「去時」

，主張又是以「去兵」爲先。孟子主張「善戰者服上刑」，又認爲善爲陣善爲戰者是大罪，而是不以爭城奪地，闢草萊，殺人盈野爲功高。孔孟的這種主張，即是所謂「王道思想」的表現。雖然並不會否認弔民伐罪的「仁者之師」的義舉，但已給與後世政治上以非戰的暗示，泥古的人們常是執一以概其餘。再益以儒家的思想數千年來素常被統治者卸用作「帝王之術」，此種非戰的暗示自然深澈的影響到了政治上；從而士風萎靡，志氣消沉，不僅外侮不能抵禦，就是內亂也常感着缺乏鎮壓的能力。

老子主張「無爲而治」，根本上連孔孟的仁義和法家的法治也認爲是糞土。他生當春秋之際，諸侯互相兼併，戰亂不休，所以更進一步而嚴厲的倡導非戰之論。他認定是：「佐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曰：「以道佐人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他的非戰思想，是由其「知止不爭」的論理思想而來，因此，他主張去兵以求和平。他去兵之術便是在以「柔弱克剛強」。不然，即使用兵以強制服人，也是不可久遠的；因爲「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的。他的這

種思想影響給於後來中國政治以重大的影響，其影響於國防的建設，可說與儒家的王道說具有相等的力量。

主張兼愛的墨子是強調着非攻的。他在「非攻上篇」論攻的不利；在「非攻下篇」論攻的不義；所有一切的議論，都在用嚴密論理，以及層層剖釋的方法以見戰爭的「不利」與「不義」。可是，墨子雖然非攻，却完全是在反對私人的侵奪爭殺，和攻擊的對象在強侵略；至於爲了保障國家社會的生存計，必需具有抵抗力，實有嚴密守備的必要。因此，他說：「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著攻之。」又說：「其爲甲盾伍兵，何以爲？以禦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伍兵者勝，無者不勝。」由他這段說法，再加上在「備城門」，「備蛾傅」諸篇中所論的守城備敵方法，一個國家只要不是在遂行着不利不義的侵略戰，爲了抵禦外侮而措辦的國防建設，是一個國家所必需的。

上述具有非戰思想的四位中國先賢，每一個人在中國學術上都成了一家；而每一家的創始和擁護者，又都僕僕皇皇，爭思以其道易天下。結果，如果某一學派的人得志，只要

他的能力有足以左右政治的力量，當日的國防建設每每感受着他給予的嚴重的影響。

本來孔孟也正如墨子似的，僅在非難侵略之戰，而對於一個國家防禦守衛的抵抗戰，爲了民族生存而發生的神聖戰爭，並不是一味的廢棄不備。尤其是孔子的「嚴夷夏之防」的思想，不僅成爲中國數千年來民族意識的最高範疇，而日本能有今日之強盛，也是很得力于吸收到此種精神，從而發揚光大之。

關於孔子，固然現今激進的份子以爲他的倫理思想削弱了國家的命脈，使人專注重于「家庭」而輕視了「國家」，不過，他的「嚴夷夏之防」的訓教所給予後世以民族意識凝固的影響，早爲一般有識者所承認，我們是不能盲目的根本剔除。

自然中國的先賢們是標榜「王道」與「和平」的。可是在文獻中所表現的却并不盡然，而在民族意識方面却還是與別的國家一樣的強烈。所謂「和平」，所謂「王道」，那只是成了一種民族意識的最高範疇；對內是以「和平」與「王道」治天下，對外是以「和平」與「王道」去撫綏或抵禦外侮，絕不會純然佔在帝國主義者的立場，以拓土開疆，窮兵黷武爲能事。（如秦皇漢武的行徑，後世均一致的加以非難。）卽如上述的以「和平」與

「王道」相倡導的儒家，在承平之世固然是治平的輔弼，然而一至亂世，他們更顯出了他們之「實用」與「涉世務。」春秋一書中所記的「內諸夏・外夷狄」，不是當今德、意、英、法、西、斯國家所標榜的「超絕愛國主義」(Chauvinism) 而是我中華民族極早的民族主義最高原則之樹立。自是以後，我炎黃裔胄雖然數次忘於胡族，卒能光復舊有山河文物者，都是收效於「嚴夷夏之防」的古訓。據已故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的意見，孔子作春秋而多言齊桓與晉文之故，因為管仲能「攘夷狄」，不然中國披髮左衽之嘆，恐早成了事實，怎能掙扎到數千年後？繼後秦皇漢武之攘夷，以至歷次異族內侵之不能成禍，而一直到晉朝始有五胡之亂者，這九百餘年間中國之能或金甌之勢，都是源於「內諸夏・外夷狄」的春秋之遞相傳習，綿延不息。更是自此之後，中國雖有宋明兩朝的被異族征服，然而也卒能先復者，此九百餘年間之餘澤也還是春秋「內諸夏，外夷狄」之大義的效力。(即管仲尊王攘夷之事。)

在中國文化遺產中有了這種凝固的民族意識，故中國能在經過多次外患侵陵中，經過多次的滅亡與復興，直能巍然獨存至現在。雖有「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的古訓，雖有

古聖先賢非戰的主張，雖然在文學作品中有不少咒詛戰爭的描寫，但仍能循着所謂「之師」的途徑，在不侵陵外族的原則下從事於自國疆土的捍衛。

(二) 中國古代軍事家的戰爭觀

近年來因爲外患的頻臨，東北四省的失陷，以及華北的特殊化，緬懷着五千年來黃帝子孫的偉大文物，常常使人發生國脈將斷之感。然而三年前蔣委員長發表的對外宣言，却明白宣言「吾人以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爲和平最後的努力。」即是說，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人們對於一個負有國家軍事最高指揮的人所發表的有「和平」傾向的談話，在羣情激昂的當時是認爲未足的。然而誰知這種「和平」的高唱是與「犧牲」相連的，并不全是在以「和平」的方法，屈辱以免「犧牲」。如果以中國習用的熟語來說便是所謂「王道」。因此，試來檢討古代軍事家對戰爭的認識，對於牠給予後世的影響，對於抗戰中和平與犧牲的了解是有很深長之意味的。

我們試一翻閱中國歷代的史乘，都是王道思想的表現。自然，伴隨着政治而爲升沉的

軍事學，也不得不以王道思想爲標的。因爲兵凶戰危，聖人乃是不得已而用之。孔子在對治國根本的答問上，主張足食足兵，在不得已而去時，又以去兵爲先。孟子和孔子一樣主張以仁義治天下，故曰善戰者服上刑；儒家的思想雖是在漢朝始成爲中國的正統思想，然而在孔子以前的名將們的思想却早也是王道的。——現在試舉孫吳，尉繚子，六韜三畧等書中的王道思想，來作一個佐證。

孫吳的兵法十三篇，在真僞方面常是聚訟紛紜，但是至少可以代表當代的軍事思想。關於他的學說，宋梅堯臣評爲「戰國相傾之說」，但是在作爲始計第一的文中却明白地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這便是在興師起事之初，先審己量敵而計其勝負之情的意思，如能細校五事而索其情，則勝敗不難預測。但是他又把「道」列於五事之首，可見「道」之重要。據趙虛舟的詮譯說：「道者，天之所助，故次道。地可避而天不可爲，故地次天。將可學而地不能，故將次地。有善將則有善法，故法次將。」那即是說，用兵者以能用「道」爲先。因爲道是「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

之生，而不畏危也」(孫子)這種道的解釋雖說是「有道之君」的本分事，但是歷代賢者之用兵，沒有做到這點便無所恃。我們試一細察孫子所言，頗與歷代有道之君底行徑相脗合。因為要令民能與上同意，能可與之生死，非辦到節用愛人，使民以時；與民同好惡；省刑罰，薄稅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然後可臻王道之境。這樣「王道之民，便會同心同德，尊君親上，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耳目。」可以與之同生死，一切外患與戰爭都不用畏怯了。但是在實際的運用，孫子也並不是主張逸乎道的範圍以外，忘事窮兵黷武，而還是一本王道的思想，『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只要一翻檢孫子十三篇中，他兢兢焉常以多殺爲戒，處處顯露着惻怛惻恤之意。

與孫子同爲人樂道的吳起，也同具有王道的思想。他說「道」是「反本復始」的，卽行事物之所當行，而反求根本，藉以復還其始初之稟受。因爲人之初生，渾渾噩噩本無所謂善惡，人人均能持「歸真返璞」之意旨，一切鬥爭均可逐漸戢息。又曰「義者，所以行事立功。」意卽是說，行事立功必本乎心之制事之宜，如湯武之伐桀紂，因是順天人而伐罪，故可謂合乎義之戰。反之，『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富貴，患必及之。』這

種不能修德之害，必至敗國亡身。『是與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爲立國之基本要素，正所謂『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是也。果能如此，不論制國或治軍，以禮教之，以義勵之而使有恥，因爲人一知恥，勇便以生，而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了。

尉繚子在論制國時之運用禮義廉恥，較之吳子更進一層，戰威篇說：『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爲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之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此後只言王上者應以禮信親愛孝慈廉恥率其民，但是，國不治而不能用兵，也即是未與師前的先決條件。

太公的陰符篇被認爲詭辯之士及後之言兵者所借託僞造，但今世所流傳的太公六韜和三略，至少是後代依據當時事實而作；我們至少可以相信，那些去古未遠的東西，也可以供我們一部的參考。因此，現在也根據坊間的六韜三略來略論到他所用以輔弼文王的軍事政治上的王道思想。他本是布衣而以魚釣于文王，文王載歸而立爲師後，一切大計都聽命於他，極力「陰謀修德以傾商政。」試觀他在初對文王問天下歸從之道時的答辭，即已滿